

新博物馆学的引入、发展与未来

The Introduction, Development and Future of New Museology

王思渝

Wang Siyu

(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 北京, 100871)

(School of Archaeology and Museology, Peking University, Beijing, 1000871)

内容提要: 新博物馆学在我国的引入和积累并不一定能促成一个更为学理化的现代学科的发展, 它自身的脉络也存在着分散性和不统一性。但是, 通过梳理其不同脉络的发展路径可以看到, 其在对博物馆“物”性的反思、“自下而上”等问题上仍然有共通之处。新博物馆学在我国并非已然“成功”或“失败”, 作为一个研究话题, 其仍有诸多研究方向值得展开。

关键词: 新博物馆学 现代学科 发展脉络 物 社区

Abstract: The introduction and developing of new museology in China didn't necessarily lead to the mature of museology as one modern discipline. The branches of new museology are still scattered and un-unified. Meanwhile, there are still some common grounds of such branches, such as reflection on the museum object, or pursuing of grass-roots development. The success of new museology in China is still questionable, but as one of the researching subjects, there are still much more meaningful issues to develop.

Key Words: New museology; modern discipline; developing routes; object; community

如果博物馆学能够被看作一门独立而清晰的现代学科, 那么在理想状态下, 我们应该能寻找到它的理论基础(以多名学者的思想体系作为文献基底)、研究方法、分支领域和诸多前沿学派。可惜的是, 从现状来看, 这一系列的现代学科要素在博物馆学中并不清晰。尽管如此, 在博物馆学的发展史上也不断有研究者试图梳理这一脉络。在梳理的过程中, 新博物馆学作为20世纪后半叶之后对博物馆世界产生广泛影响的理论, 时常被提及。

一、引入

“新博物馆学”作为一个系统性的学术概念被引入我国, 首先与一批前辈学者的工作密不可分。例如, 《中国博物馆》作为国内博物馆学领域起步较早的学术期刊, 在1986年第4期便译介了一批文章, 介绍了作为“新博物馆学运动”的重要内容之一的生态博物馆。苏东海先生1995年在《中国博物馆》发表文



章，阐释了自己对生态博物馆概念的思考^[1]，也从另一个角度宣告了生态博物馆在中国的实践步入高潮。与此同时，越来越多的学者注意到，生态博物馆（以及曾一度被认为与之类似的社区博物馆）无论是在理论还是实践上，都不能完全代表“新博物馆学”的全部。甄朔南先生在2000年以后多次发表文章论述“什么是新博物馆学”的问题。在他的论述中，“新博物馆学”已经被诠释为一种对“旧”博物馆学基础的整体反思，彼特·弗格所主编的《新博物馆学》一书更受重视^[2]。实际上，如果我们回到彼特·弗格的原著中，就会发现书中并没有直接提出社区或生态博物馆的概念，但是在甄朔南先生的文章中，仍然倾向于将这诸方面的问题协同起来考虑。按照甄朔南先生的诠释，“以人为本”中“人”的概念成为连接新博物馆学与中国的社区、生态博物馆实践间的重要纽带^[2]。

据此，我们似乎可以认为新博物馆学的引入有两条脉络^①。一条以社区、生态博物馆这样更为新式的博物馆形态为直接的表现形式；一条则不限定在特定的博物馆类型上，以对“旧博物馆学”以“物”为本的整体反思为动力。如果我们站在今人的立场上去看这两条脉络在学理上的联系，并不难发现其背后的共通性；但是，如果回到学术史层面，我们也不难发现，这两条脉络在引入我国之后，其发展的路径仍是有所不同的。

今天的研究者对这两条脉络进入我国后所面临的问题怀有充分的兴趣。但是在这里值得一提的是，实际上，新博物馆学进入我国本身便是一个值得关注的话题，它反映了我国世纪之交面临的一系列政治、经济和社会的复杂面相。全球化进程的加快，使我国博物馆和文化遗产领域的国际交流增多，这构成了新博物馆学被引入的最直接动力。而当新博物馆学被引入我国之后，我国民族国家意识的强化、决策习惯的高度行政化、市场经济势不可挡的发展趋势、社会组织和社会参与意识的萌芽、

全球化浪潮下更“西化”的社会文化理念的交融，都构成了新博物馆学在我国进一步发展的整体背景。只有理解了这一背景，对于新博物馆学乃至一个更广阔的博物馆世界的现状和未来才会有更清晰的认识。

二、两条脉络

关于新博物馆学的这两条脉络，以社区、生态博物馆运动为代表的“新博物馆学”实践形态，其路径要更显清晰。关于生态博物馆在我国的实践，尹凯的研究已做过比较明确的梳理^[3]。相较来说，社区博物馆的实践显得略为分散，但单霁翔的论述也可做参考^[4]。本文不再赘述这二者的实践过程，简言之，因官方推动，其在21世纪的第一个十年间以一种革新者的姿态迅速在全国范围内推广。

时至今日，学术界对这一系列实践的讨论颇多。以“成功”或“失败”来评价这些实践，或都略显偏颇。有研究者质疑，社区、生态博物馆运动只能是一种乌托邦式的理想；而同时也有研究者主张，从一个学科发展的角度，这两类博物馆的发展推动了博物馆学界对诸多问题的讨论。这些观点可被归纳为下述两类。

第一，社区、生态博物馆将博物馆学既往研究中长期视为“第一性”的“物”的概念，正式从单体的乃至可移动的“物”延展到更为广泛的环境（包括自然与人文）乃至活态意义上的整体生活。

第二，从博物馆术的角度，社区、生态博物馆其实并没有完全摒弃传统的以收藏、研究、展示和教育为核心的博物馆术；只不过，随着“物”的概念的延展，其具体的工作内容和对象也开始有了不同的侧重。相较于此，在这个过程中更为重要的话题或许在于，一套“自下而上”的赋权思维以更为强势的姿态介入博物馆学领域。如何实现在特定范

① 这并不表明本文认为“新博物馆学”仅有这两条脉络。在英文世界和中文世界中，都有诸多研究将20世纪后半叶以来所呈现的一系列更新的博物馆动向均看作“新博物馆学”，这里面部分内容属于误用，也有部分内容属于学者自我的阐释。只不过，从博物馆学的整体发展现状来说，仍以这两条脉络的影响更为明确，故本文的讨论集中于此。



围内社群的自我认同、如何在博物馆的管理运营中融入在地社区更大程度的参与,以及我国在此类问题上究竟面临着哪些层面的挑战等,诸如此类的话题成为学术界热议的题目。

相较于社区、生态博物馆而言,上文提及的以对“旧博物馆学”的整体反思为动力的、第二条脉络的“新博物馆学”其实面临着一定程度上的归类困难。这主要体现在实践层面,一方面脱离了诸如社区、生态博物馆这样特定的“标志物”之后,我们其实很难明确地将一个更广阔范围内博物馆世界发展中的哪些部分看作“新博物馆学”直接推动的产物,而哪些仅是一种“默契”罢了;另一方面,从研究的角度来说,国内关于这第二条脉络的“新博物馆学”的相关论述倒存在着更为明显的一致性。

这些论述的主要观点是:强调“新博物馆学”在更广范围内的反思性和批判性,不以特定类型的博物馆为对象,而是整体不满于博物馆过于以“物”为核心并且脱离社会现实的旧况,要求博物馆去权威化并重新定义其机构性质,“后现代”色彩浓厚。具体来说,社区概念更受重视。这体现在,一方面收藏、展示、教育等各方面均强调面向社区更大程度的开放,另一方面也将社区概念本身的复杂性、政治性等问题引入到博物馆研究和实践的视野中^{[5][6][7]}。

在这个过程中,这第二条脉络与上述第一条脉络类似,其在我国的发展也同样面临研究者的进一步质疑。总体来说,由此引发的问题也可归纳为两类。

其一,当博物馆不断被去权威、融入当代社会之后,其是否会丧失基本的专业^①,博物馆由此是否会失去自我的独特性。

其二,这种去权威式的博物馆理念在我国是否完全展开,此问题本身便是饱受争议的。一方面,我

国官方在不断开放文化机构、向更广义的受众一侧贴近,市场层面的“社会力量”^②也在不断向博物馆世界渗透,因此,一些突破传统桎梏而带有更强平民性乃至批判性色彩的收藏、展览、教育案例也屡有出现;但另一方面,由于我国“第三部门”的力量相对薄弱、身份政治等问题仍有待解决,博物馆建设的主导力量仍然有挥之不去的权威化色彩(无论是从政治性还是知识性的角度),走向“社区”被泛化为更广义地贴近“观众”。因此,这样的发展现状是否等同于新博物馆学的理想,学者的意见并不统一。

三、一个学科?

综上,我们简要地回顾了新博物馆学进入我国后所呈现的不同发展脉络。

以此为基础,我们如果回到一个更为学理化的层面来理解新博物馆学的发展,我们能够意识到,上述这两条脉络与“旧博物馆学”的融合与对话是否已然真正展开仍然是值得质疑的。尤其是从目前来看,这两条脉络在背后的推动力、主要研究对象乃至从事此工作(无论是学术还是实践层面)的学术共同体等诸多问题上都并不完全一致。因此,我们无法以此来认定一个更为学理化的学科已然成型。

只不过,在这个过程中同样应该承认的是,这两条脉络的诸多共通之处值得我们注意。

第一,这二者身上都伴随着对博物馆世界内以“物”为中心的思想或工作方法的转移,都在解构和重塑“物”,只不过社区、生态博物馆式的运动从“物”这一对象本身的内涵和边界便已入手,而整体反思性的“新博物馆学”则更偏重于对与“物”有关的工作方式的转型。

第二,二者都与20世纪后半叶以来更为广泛

① 这方面的讨论实际上当国际社会最初试图确立新博物馆学的地位时便已经发生过,详见皮埃尔·迈朗. 新博物馆学的确立[J]. 国际博物馆(中文版), 2016(Z2).

② 笔者认为有必要区分在不同语境中所论的“社会力量”一词。在更为经典的社会科学研究中,其主要指区别于政府与市场部门之外的第三方力量;而在现实的政策语境中,该词多指包括了市场力量在内的非政府力量。



的时代背景存在着明显的关系，后现代式的学科转型、“人”的权力问题在伦理正当性和政治社会运动实践中的兴起都在推动着博物馆不仅强调面向无差别的更广阔人群，而且还需要重新发现更底层、边缘的人群的价值。

四、未来发展

总体来说，我们对于新博物馆学的学科地位的评价仍然可以是复杂的；但无论如何，新博物馆学的引入和发展即便不能立刻促成一个更为学理化的博物馆学学科的形成，即便从实践的层面来说也难提已然成功；但是它对我国今天的博物馆学研究和博物馆实践来说，依然具备未来发展的可能性。

诸如“社区”“整体社会”这样的概念，在新博物馆学的既往讨论中虽然已受到足够的重视，但是在部分研究中难免带有博物馆或遗产保护为先的先验立场，容易陷入表征导向或文化拼图的陷阱。如此一来，博物馆世界反而难以了解这一系列的概念本身的复杂性与流动性。不断呼吁的社区赋权和不断兴起的观众研究，并不能从本质上替代研究者以更具日常性、整体性的眼光进入一个特定的研究领域，理解其背后的政治、经济和社会关系。

再如，“自下而上”“社区参与”等问题（无论是对于上文所述的哪条脉络而言）在我国的语境下是否完全只能是一种“理想”？在过往的研究和

实践当中，都不免存在着过于期待将新博物馆学带来的产物视为一种更为激进的措施，进而在更短期的时间内改变特定的区域的倾向。实际上，正如部分研究中也曾注意到的，新博物馆学的倡导在于以一种过程导向性的思维将一套博物馆术放到一个更为常态化的整体社会生活中，它所强调的与社区的互动本质上是一个更为长期乃至潜移默化的过程。只不过，在过去所常见的高成本、绩效化的投入模式下，所谓的“过程”“常态”“长期”等理念便显得很难实现。或许，未来我们仍然需要更退一步，理解新博物馆学本身并非是一种创造，而将其视为博物馆工作的方法论，它对“社区”“整体社会”等问题的介入本身是融入性的而非改造性的。它需要与更广泛的学科建立起联系，来共同记录、促成“社区”“整体社会”的变化，也同时在这种共同参与当中发挥博物馆术的价值。

这都意味着，新博物馆学之后的博物馆学研究需要关注博物馆所处的更广阔世界。新博物馆学在很大程度上拓展了博物馆世界的边界（无论是“物”的概念的拓展、博物馆业务范围的扩大，还是村落与城市的博物馆化）。这种边界的扩展意味着，博物馆作为一个社会存在，它与更广泛的主体之间的政治、经济和社会关系会在更大程度上暴露出来。而对此类问题的研究，都将为博物馆学研究和博物馆实践提供重要的支撑。

参考文献

- [1] 苏东海. 关于生态博物馆的思考[J]. 中国博物馆, 1995(2): 2-4.
- [2] 甄朔南. 什么是新博物馆学[J]. 中国博物馆, 2001(1): 25-28, 32.
- [3] 尹凯. 生态博物馆: 思想、理论与实践[M]. 北京: 科学出版社, 2019.
- [4] 单霁翔. 从“馆舍天地”走向“大千世界”: 关于广义博物馆的思考[M]. 天津: 天津大学出版社, 2011年.
- [5] 尹凯. 重置与转向: 当代博物馆理念的梳理与思考[J]. 东南文化, 2018(4): 82-89.
- [6] 沈森. 博物馆批判: 彼得·弗格与20世纪80年代英国新博物馆学[J]. 湖北美术学院学报, 2020(3): 110-114.
- [7] 黄丹麾. 新博物馆理论与后博物馆学[J]. 中国美术, 2013(5): 156-159.